

20世纪心理学通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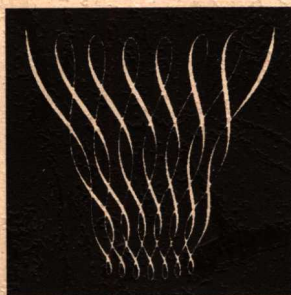
发展的自我

Psychology

The Evolving Self

[美] 罗伯特·凯根 著

韦子木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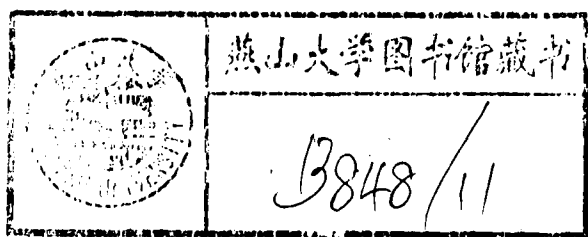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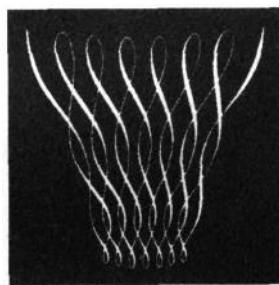
20世纪心理学通览

发展的自我

The Evolving Self

[美] 罗伯特·凯根 著

韦子木 译



55-
10

浙江教育出版社



0370627

责任编辑:王晴波
封面设计:池长尧
责任出版:温劲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发展的自我/(美)凯根著;李维译. -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8

(20 世纪心理学通览)

ISBN 7-5338-3268-X

I. 发… II. ①凯… ②李… III. 自我-研究 IV. B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5103 号

20 世纪心理学通览
发展的自我

[美] 罗伯特·凯根 著
韦子木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排版(文三西路金都花园)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125 插页 4 字数 260000

印数 1—5160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8-3268-X/B·34 定 价:17.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20 世纪心理学通览”序

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相当的年轻,但其源起,却可溯及人类思想的萌芽期。18 世纪之前的心理学思想,散见于古希腊和中国哲学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官能心理学家、科学革命时期的机械论者等著述之中。到了 18—19 世纪,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若干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包括联想主义、自然主义、实证主义、进化论、科学边缘的研究和实验生理学等,加速驱动着心理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为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提供了基础。然而,心理科学的真正发展则是在 20 世纪。回顾一下心理科学在这百年间所取得的成果,不仅有助于人们认识心理科学自身的地位和作用,为今天的研究提供比较的范本,而且可以为 21 世纪心理科学的基本走向提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促使心理科学更加健康地发展。我们出版“20 世纪心理学通览”的目的就在于此。

20 世纪的心理学出现了不少流派,成立了许多学术组织,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文献,影响十分广泛。“通览”以 20 世纪心理学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一派、一家、一人、一说为选题原则,涉及到的流派有元素主义、构造主义、机能主义、行为主义、策动学说、格式塔原理、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历史学派、认知理论、人本主义等。有些学派还可进一步分成若干家系。从每一流派或家系中有所侧重地选出一位创始人或代表人物的学说,从中

可以看到这些学说对 20 世纪心理学发展的影响,以及它们自身的地位和成就。当然,有些学说所属流派的划分并非十分严格,只能以思想观点大体相近为依据而暂时归入一个流派的名称之下。至于一些跨派别的学术著述,则根据其侧重的研究内容和方向,相应地归入人格、测量、人与社会等类别。

在“通览”中,每本译作都附有译序,旨在对倡导某一学说的代表人物及其学说在 20 世纪心理学中的地位、影响和价值做一基本的阐释,以说明为什么选择该书的理由。至于译序中对历史上同一具体问题的看法,译者之间可能存在一些差异,对此,难以强求一律。译序中的观点和结论由译者自负责任。此外,由于同一术语和概念在不同作者和不同时期的学说中表达的意思并非完全相同,所以,专业术语或概念的译名可能不尽一致,甚至同一人名译名,除约定俗成的外,也有可能不统一。对此,在主要术语和所有人名后都附有外文原文,以便读者辨析。

由于资料来源、外国语种、“通览”篇幅等方面的局限,加之我们经验的缺乏,所收的流派还不够全面;由于授权有先后,译作有快慢,很难依照流派活跃的年代、著述发表的年份、流派本身的结构、流派之间的关系等,有顺序、分类别地出版这部《通览》。对这些不足,我们将在具体的工作过程中适时地调整。对于这部“通览”为什么选定这位代表人物而不是那位代表人物,为什么收入某位代表人物的这部著述而不是那部著述等问题,读者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来自各方的意见或建议,我们表示真诚地欢迎和感谢。

浙江教育出版社

中文版译序

罗伯特·凯根(Robert Kegan)系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教授,麻省理工学院专业心理学指导委员会学术委员,马萨诸塞州贝尔蒙特临床—发展研究所所长。凯根以其三大贡献著称国际心理学界。首先,他是全美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反对心理障碍临床疗法的学者,认为临床疗法不是解决心理障碍的最佳手段。相反,解决心理障碍的最佳手段是“自然疗法”,它并非心理诊所的专利,每位家长或教师都可以在家里或学校里实施这种疗法。时至今日,由于他的努力,自然疗法与临床疗法已经成为心理专业领域内治疗心理障碍的两辆马车。其次,他既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又是一位著名的作家。用文学作品的形式阐释心理学理论,这在国际心理学界也不多见,而凯根则是一位公认的佼佼者。他的小说在西方世界十分畅销,并被全美作家协会誉为“最具激情”的小说家。再次,他创立了“结构—发展”理论(constructive - developmental theory)。在美国,关于自我心理学的研究,历来为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两大学说所垄断。“结构—发展”理论是继这两大学说后问世的第三大学说。凯根也由此确立了他在心理学界的学术地位。

《发展的自我》(*The Evolving Self*)是凯根的代表作。在这部著作里,他第一次完整地阐释了他的“结构—发展”理论。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他的阐释形式中,欣赏他的另外两大贡献,即自然

疗法的实施和心理小说的布局。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他的“结构—发展”理论。



在自我心理学研究领域,历史上曾出现过两大学说。一种学说以精神分析为代表,包括新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和新精神分析的客观关系论。这一学说强调自我在心理结构中的地位,强调自我与欲望的关系,尤其是强调一个人的早期经历对其后来成长的影响。另一种学说以存在主义为代表,包括现象主义的自我发展理论。这一学说强调自我的临床心理咨询,强调自我与爱和意志的关系,尤其是强调社会氛围,包括社会性理解、尊重和关怀对个体自我发展的影响。在凯根看来,精神分析理论关于早期经历的阐释,对皮亚杰(J. Piaget)后来倡导认知发展阶段论产生过启发性的作用。存在主义理论关于社会氛围的研究,对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后来倡导自我实现理论产生过启发性的作用。皮亚杰强调阶段模式,而阶段模式实际上是一种“结构”模式。罗杰斯强调实现过程,而实现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发展”过程。

凯根倡导的“结构—发展”理论,就其理论渊源来说,派生于皮亚杰的“结构”和罗杰斯的“发展”。但是,这一理论又非皮亚杰学说和罗杰斯学说的翻版。相反,凯根是在扬弃和吸纳这两种学说的基础上创立“结构—发展”理论的。目前心理学界所谓的“新皮亚杰—罗杰斯主义”,指的就是这种“结构—发展”理论。

“结构—发展”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意义采择”(meaning-making)。一个人的自我是怎样发展的?在凯根看来,它是在一

个人采择社会意义和生活意义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人是一个意义采择者。这种“采择”包含下面几层意思。

1. 所谓的“意义”,包含相当宽泛的内涵。一个人对他人的认识是一种意义,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也是一种意义,一个人对自己—他人关系的认识还是一种意义。至于一个人对自己过去经验的组织,对当前周遭的理解,以及对未来发展的预期等等,也都是意义。如何采择这些意义,或者说如何“梳理”这些意义,决定着一个人究竟接受哪些意义和否定哪些意义。学过心理学的人都知道“双关图形”,包括“花瓶—脸庞”双关图形和“少女—老姬”双关图形。一个人究竟是把花瓶或少女作为对象,把脸庞或老姬作为背景,还是相反,取决于他把何种对象作为意义来采择。自我发展也是同样道理。一个过于自我中心的人,是很难把他人的意见作为积极的意义来采择的。他既有可能强化自己的意见,忽视他人的意见,也有可能张扬自己的意见,贬抑他人的意见。这样的自我,问题出在他把自己的意见看作是唯一有“意义”的,并加以采择。由此推导,一个人的心理健康或心理障碍,均可从其采择生活意义的方式和取舍中觅得根源。

2. 意义采择涉及两种显然不同的活动:静态和动态。采择意义的过程是一种动态过程,一种表明生命存在的运动,一种呼吁生活质量的运动。这种活动由自我来实施和体验,也即由一个人作为构成意义、拥有意义、保护意义、增强意义,或者威胁意义、失去意义的操作来体现。

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这种活动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如果一个人对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或者自己和他人的关系感到平衡,也即他采择了平衡的意义,他就会按照这一意义去理解生活和处理生活。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平静的”。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在《印第安人的营地》这部小说中描述过

一个名叫尼克(Nick)的小男孩的意义采择。尼克随父亲到印第安人部落为一位妇女接生。当他们抵达印第安人营地时,尼克听到产妇的尖叫声。在尼克的脑海里,父亲之所以赶往那个营地,是为了解决尖叫声。在接生过程中,尼克亲眼目睹了这样的场景:产妇的痛苦和父亲沾满鲜血的双手。然而,正是一个女人的勇气和一个男人的技术,使一个新的生命来到了世界。在乘小船回家的途中,尼克注视着父亲那双有力的手,以及那双手所作出的有规则的划桨动作,他想到了印第安人营地的那个小生命,想到了自己与生命的关系,想到了自己的来之不易,他心里感到平静和感激。只要父亲在他的身边,他——尼克——决不会死。这里,尼克对“意义”的理解,使他的采择活动在一个相对的时间和空间里处于静止状态。这种静止状态表现为:只要父亲在他身边,他用不着为生命而担心,他可以放心地生活下去。每个人都有过尼克那般的体验,即在一个相对的时间和空间里,没有冲突,没有紧张,业已采择的意义可以使他平静地、安全地过上一段日子。在这个意义上说,采择活动是相对静态的。

然而,任何静态都是相对的,因为平衡是相对的。如果一个人对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或者自己和他人的关系感到失衡,也即他采择了失衡的意义,他就会按照这一意义去理解生活 and 处理生活。失衡涉及到是保护自我还是丧失自我,涉及到对自我的重新认识。这时,意义的采择活动是动态的,因为自我若想维持自己,必须依托动力。凯根曾以一位母亲的失衡为例来说明采择的动态过程。一位母亲为周末的晚餐而心烦意乱,因为那顿晚餐别具意义:女儿和女婿要来,儿子及其女朋友也要来。她既要为丈夫爱吃的菜肴而操心,又要给未来的媳妇留下好印象,还要照顾到已经失业的女婿的情绪。于是,她来到超市,匆匆购物。当正准备离开超市时,她遇到一位母亲,带着白痴的孩子,

手里拿着两种不同的芥末向她询问价钱。就在这一瞬间,她震惊了。那天晚上,当她的孩子和客人入睡后,她却睡不着。她开始哭泣,为那位母亲和她的白痴儿子如何生活而哭泣,为那位带着白痴的儿子在问芥末价钱的母亲而哭泣,为那个有着生命的白痴而哭泣。她为周末的那顿饭在忙碌些什么?那位带着白痴儿子的母亲在忙碌些什么?她在购物时想些什么?那位手里拿着两种芥末在问价钱的母亲在想些什么?所有这一切,使她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发生冲突,她处于失衡状态,她的意义采择活动是动态的。

3. 只要一个人不停止意义采择,平衡总会走向失衡,失衡也总会导致平衡。平衡—失衡—再平衡—再失衡,是意义采择的必然过程,也是自我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个平衡是一个阶段,再平衡是另一个阶段。以此推导,从平衡到再平衡,一个人经历了两个阶段。阶段的连续,形成一种结构。“结构—发展”理论的“结构”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或者说,该理论所谓的“结构”指的是平衡,以及由平衡来标志的阶段。

一个失衡是指某一阶段向下一阶段的过渡,再失衡是指下一阶段向再下一阶段的过渡。以此推导,从失衡到再失衡,一个人经历了两个过渡。过渡的连续,表明一个人不断地告别旧的意义而采择新的意义,表明一个人的自我在发展。“结构—发展”理论的“发展”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或者说,该理论所谓的“发展”指的是失衡,以及由失衡来标志的过渡。

为什么会出现平衡—失衡这一现象?在凯根看来,关键在于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文化的作用,另一个因素是个体的认知水平。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家庭、学校教育、同伴团体等,也有不同的文化。对个体来说,自他来到世上的那天起,他实际上就处于文化的包围之中。文化以“植入”的形式影

响着个体,个体以“沉浸”的形式接受着文化。

倘若“植入”的文化与个体的认知或接受水平相匹配,双方相安无事,个体对文化所内涵的意义没有异议,则采择活动就没有冲突,个体也就处于平衡状态。这一平衡状态的时间有多长,则这一阶段也就有多长。然而,个体是在生长的,采择的意义是有积累的。一俟“植入”的文化与个体的认知或接受水平不相匹配,文化的要求高于或低于个体的接受水平,个体对文化所内涵的意义就会有异议,采择活动出现冲突,个体也就处于失衡状态。这种失衡意味着个体开始告别旧文化而迎接新文化。

失衡是危险的。但是,“危险”原本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危机,二是机会。一般说来,失衡总能使个体获得一种“发展”的机会,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接受新的文化,采择新的意义,从而向高一阶段发展。然而,失衡也有可能使个体丧失“发展”的机会,无法解决面临的危机,反对新的文化,曲解新的意义,从而倒退到更加原始的阶段。

凯根认为,自我的发展经历了下述几个阶段和过渡:从一体化自我向冲动性自我的过渡;从冲动性自我向唯我性自我的过渡;从唯我性自我向人际性自我的过渡;从人际性自我向法规性自我的过渡;从法规性自我向个人间自我的过渡。每一阶段都有相应的文化“植入”,每一阶段的平衡都面临着两大挑战:控制和放手。每一阶段都有相应的危机。所有这些,都有可能导致个体的失衡,导致一个阶段向另一阶段的过渡,导致自我的发展。

二

让我们从胎儿走向婴儿的“结构—发展”说起。胎儿生活在

子宫里的状态,代表着一种无忧无虑的境界。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寄主(host organism)为胎儿提供营养,胎儿的需要完全可以得到满足。出生本身是人生的第一次失衡,婴儿开始从胎内的文化中摆脱出来,开始了“我”的最初演化。原来一致的生活状态宣告结束,需要的满足再也不像胎儿那般方便:婴儿期间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回复到胎儿的体内平衡中去,而是使其结构重新获得一致,以便应付他所面临的生活现实。

婴儿从羊水里走了出来,生活在一个没有他人的世界上。婴儿在自己的生活和他人的生活之间不作区分,在发源于自己的忧伤或安逸与发源于他人的忧伤或安逸之间也不作区分。婴儿认为他与他的环境具有共生的、一体的关系。他的“植入”的文化,是身边的哺育者,以及哺育者的抚育方式。这种文化的“控制”,表现在亲密的身体接触、安逸与保护、亲子之间的目光交流,以及婴儿听不懂但哺育者却喋喋不休的言语表达。这种文化的“放手”,表现在不让孩子的需要随心所欲地得到满足,中止哺乳,减少怀抱,承认独立的表现,摆脱身体接触的文化模式,鼓励学步。这一平衡阶段的主要危机是,父母与婴儿在该整合时分离,在该分离时整合。

就植入文化的第一功能(控制)而言,婴儿期的到来,不仅意味着人们必须关注和照料这个小生命,而且还意味着他必须“依附”另一些人。在母婴的成功依恋中,婴儿充分表现其天赋的能力:抓住母亲的衣服,与母亲对视等。这种天赋能力吸引着母亲。一俟母亲认为这些天赋表现是令她十分高兴的行为,母亲也就会被婴儿争取了过去。在没有发生依恋的地方,母婴双方的交流会削弱。婴儿缺乏正常的“传递力量”,母亲也会因为无法对婴儿作出反应而感到沮丧。在这个意义上说,控制的功能所要考虑的不只是婴儿是否受到哺育的问题,而且还有婴儿怎样

受到哺育的问题。缺乏依恋,对孩子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最为严重的打击。由此导致的结果是焦虑。

问题是,许多父母在对孩子的焦虑作出反应时,会以某种特定的演化状态(追求平衡的状态)来对抗另一种状态(失衡的状态),并给前者增补“植入”的文化。许多父母关注的是孩子当前的演化结构,而不是孩子演化的运动;他们对如何维护业已采择的意义作出反应,而不是对正在采择的意义作出反应。他们不知道,婴儿般的依恋迟早是要中止的,焦虑是不可避免的。当他们实施植入文化的第二功能(放手)时,他们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如果说控制的目的是强调母婴的整合,那么放手的目的则是强调母婴的分化。通过分化,婴儿性的成分逐渐减少,与儿童有关的成分逐渐增加。婴儿的分化表明他启动了自己的新能力,也即他表现出站起和行走的能力,以及检验父母是否真地从他的一体化中脱离出去的能力。从整合转向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对婴儿与父母来说都是困难的。但是,个体若要发展,必须放弃有些东西,让其消失。

问题是,有些父母虽然鼓励孩子独立,但却阻拦他走向分化的步伐;孩子强烈地体验到,若想获得满足,必须保持整合,分化意味着不安全。正当孩子处于分化之际,上述的体验会使他作出妥协的举动,用整合的代价来换得分化。于是危机就出现了。

危机意味着该整合时分化,该分化时整合。凯根曾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危机。一个年方 20 岁的母亲,生活贫穷,童年时被自己的父母抛弃,由粗暴的祖父养大。由于这位母亲自身对社会缺乏深刻的依恋,因此当她有了孩子时,却不知道该为自己的孩子植入哪些文化。她几乎不能照料这个孩子。除了喂奶之外,与孩子没有任何关系。在她看来,唯有喂奶这种事情是回避不了的。虽然孩子尽力表现植入文化需要的行为,包

括哭喊、目光注视、微笑、发出叫声等,但母亲却无动于衷,无法被吸引过去。看来,这位母亲与孩子的关系主要由紧张和分离所组成。当孩子15个月后,需要获得放手的植入文化时,母亲也没有及时地提供这种文化。用凯根的话来说,她把孩子当作自己幼年时玩过的洋娃娃,想玩时拿出来抱抱,不想玩时就扔在一边。所以,当孩子2岁时,仿佛像个哑巴,面部表情显出绝对的茫然,毫无生气,注意力无法集中于任何人和物,没有口头语言……对周围人们的刺激毫无反应,好像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似的。

一体化的自我只是自我发展的一个阶段。随着控制和放手这对矛盾的出现,失衡也随之到来。孩子意欲从母亲的怀里挣脱出来,要求学步,母亲也开始中止哺乳,而且不再让孩子的需要及时得到满足,所有这些都表明,孩子开始摆脱一体化的植入文化,向冲动的自我这一阶段过渡了。

过渡意味着孩子要求重新平衡,以便把一体化自我中的有些组成成分(哺育者、周围的人和物)逐渐变成“非我”的东西,并成功地重新整合为新平衡中的一个客体或他人,也就是说,物—我需要分化。过渡本身并不单单是一个分离和扬弃的问题,并不单单是一个否定过去的问题。对父母来说,过渡是一种需要采择的意义,包括承认过去的文化,承认整合的重要性,承认现在要求分化的合理性。这是因为,对植入的文化的“抛弃”,既涉及孩子的“旧我”,也涉及孩子的“非我”,它必须为孩子自己留下一个位置,以便重新确定“自我”与“旧我”、“非我”的关系。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和理论认识,当孩子到达青少年时期,开始忽视家庭,疏远父母,甚至拒绝家庭时,父母确实是接受不了的。

三

从一体化自我向冲动性自我的过渡,是一个“去中心化”(decentration)的过程,也是一个“摆脱植入的文化”的过程。进入冲动性自我阶段,儿童的植入的文化是典型的家庭“三角”关系,以及双亲的榜样。这种文化的“控制”,表现为承认和接受孩子的幻想,处理恋母或恋父问题,以及按照儿童的认知水平传递信息等。这种文化的“放手”,表现为促进孩子从幻想和冲动的文化中摆脱出来,鼓励孩子应对他自己的情感负责,不再与父母同床,上学期间不再恋家,强化孩子的自信等。这一平衡阶段的主要危机是,该控制时,双亲的行为不一致,该放手时,双亲又以控制形式介入。

处于这一阶段的儿童,认知和情绪极不稳定。他们能够认知与其相分离的物体,但是那些物体随他们的知觉而定性。例如,一位母亲有两个儿子,一个10岁,另一个4岁。一天,母亲与她的小儿子为了一件琐事发生了争执。争执起因于蛋糕的分配。母亲给10岁的儿子分了两块蛋糕,却给4岁的儿子分了一块蛋糕。小儿子不高兴了。母亲解释说,因为他年纪小,所以只能分到一块。当他长到哥哥那样的年龄时,他就可以分到两块了。小儿子听了之后,很是不悦,为自己的命运而忿忿不平。母亲失去了耐心,以挖苦似的动作把餐刀往盘子上一放,然后说道:“你想分到两块吧?那好,我就给你两块。给你!”于是,她用餐刀干净利落地将小儿子的那块蛋糕切成两块。突然间,小儿子的紧张状态立即消散,他对母亲的“公正”表示感激,然后心满意足地享用他的蛋糕了。母亲和大儿子面面相觑,惊讶不已;此

时此刻,他们对小儿子的现实主义总算有了深入的了解。这种现实主义就是该阶段儿童的认知水平。

同样的情况也表现在冲动的情绪上。该阶段儿童的冲动控制力较差,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某种抗拒的力量,而是因为他们的认知现状。他们无法同时容纳由单一事物引起的两种情感,包括对同一事物表示好感和厌恶这两种对立的情感,以及在不同时间对同一事物具有同样的情感。儿童体验事物时,所谓“非好即坏”或者“破涕为笑”,指的就是这种情绪状态。

就植入文化的第一功能(控制)而言,年幼儿童不像婴儿。婴儿没有幻想,而且他把物—我看成是一体的,环境不是客体,而是主体,是他的一个组成部分。年幼儿童已有幻想,尤其是关于神奇的幻想(例如,成为“超人”)。而且,认识到存在一个与他相脱离的世界,认识到他人像他一样,也是一个实体,只不过容易把自己的冲动与他沉浸的文化相混淆,以为他所爱的别人也爱,他所恨的别人也恨。由此推导,当他发脾气时,他是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的。

该阶段儿童所沉浸的文化,主要是家庭背景,或者说家庭的“三角”关系。他的爱恋模式,实际上是他的意义采择。他究竟是恋父还是恋母,与双亲之一能否充分满足他的需求有关。而且,一旦他恋上了其中一方,他对另一方就会疏远,甚至把另一方的要求视作阻挠他满足的一种障碍。受宠的双亲一方能否接受这种爱恋,失宠的双亲一方能否扮演一个适当的社会角色,或者说,扮演一个不与之竞争的角色,对儿童接下来摆脱这一旧文化而迎接新文化来说是十分关键的。在这一“三角”关系中,父母不要急于培养孩子认识爱恋和解释爱恋的能力。要知道,随着孩子的成长,在儿童的世界里会进来更多的人,孩子的爱恋热点也会从“三角”关系中转移出去,结果双亲都会失宠。当然,在

这个阶段,由于孩子爱恋的倾向性,会使双亲一方感到精神压力,尤其对一位十分看重亲密关系的母亲来说,情况更是如此。对父母来说,了解下述观点是十分重要的:父母都有关键的角色可扮,只不过角色不同而已。

就植入文化的第二功能(放手)而言,重要的是,在儿童要求独立,要求分化,要求摆脱“三角”关系的爱恋模式时,父母既要大胆放手,又要有所限制。对父母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其中一方单纯地卷入控制的活动,而另一方则单纯地卷入放手的活动。放手的任务应由父母双方来担任,他们应以联合的方式帮助孩子逐步认识自己与父母的适当界限,认识自己与自己冲动的界限。例如,一天傍晚,一个8岁的男孩说,他已经吃足了父母的苦头,决定宣布他想离家出走的念头。于是,他把一些东西装进一只小皮箱,走出了屋子。当儿子走出屋子,与邻居的几个小朋友一起玩时,父母谨慎地从窗子里向外望着。没过多长时间,天色暗了下来,到了吃晚饭的时间,男孩的朋友们都纷纷回家去了。男孩靠着他的小皮箱站了一阵子,然后,步履缓慢、神情沮丧地开始走回家来。父母开始考虑,当他们与儿子重逢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看到儿子脸上羞愧的表情,不想使他进一步出丑。因此,在吃不准究竟该怎么办,的情况下,他们作出了这样的选择:当儿子转回家门时,父母坐着不动,而且闭口不言,给孩子送去一种不想询问原委的眼光。儿子坐在父母对面的椅子上,也表示沉默。最后,家里养的一只猫奔跑着穿过房间中央。男孩抬头一望,并对父母说:“我看你们仍旧养着那只老猫。”连年的演化和辛苦所赢得的分化便在这句“你们”之中。

上述事例,不仅对孩子而且对父母来说,都是一种失衡。“你们”这句话意味着主体与客体的分化,意味着孩子要求摆脱“三角”关系的愿望,意味着过渡的开始。幸好,男孩的父母在处